



# 会理会议再认识

陈清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市 100006)

**摘要:**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但这种“只走路不打仗”的战略却在部队中引发了普遍的动摇情绪。出于对红军的高度责任心,林彪向中央写信要求更换前敌指挥,却造成了当时权威地位尚未树立的毛泽东对彭德怀与张闻天的怀疑和猜忌。在当时的革命者团结一致、顾全大局的精神下,会理会议克服了党内、军中的动摇情绪,统一了思想认识,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会理会议;毛泽东;林彪;张闻天;彭德怀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1-0173-03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作,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红军声东击西、迂回穿插,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但当时,在中央的战略意图未被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抱怨。加之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役没有打好,不仅在基层即使在红军领导层中也很有怨言。这种普遍的动摇情绪被反映到中央后,1935年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今后红军的行军方向作了重要决定,克服了党内、军中的动摇情绪,统一了思想认识,对红军的顺利长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已有一些文章对会理会议做出了研究<sup>[1]</sup>,但多受后来的政治因素干扰,分析略显粗略和武断,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试作新的分析。

## 一、林彪的意图

林彪的信是会理会议的直接催生物。虽然会理会议的内容和意义远远超出了这封信的范围,比如,作出了“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苏区”<sup>[2]</sup>的战略决策,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红军和领导机关作了整编和精简,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行动的灵便性,但由林彪的信所引发的问题却也是会理会议所讨论的重点。

林彪的信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为何林彪给中央写出这样一封信?首先,这是林彪对四渡赤水以来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针不满的产物。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说我

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sup>[3]</sup>其次,林彪的信也是对部队中抱怨情绪的反映。“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sup>[4]</sup>

林彪的信是不是还夹杂有自己在政治上的私心?从林彪前后的行为来看应该没有。从四渡赤水开始,林彪就一路牢骚不断,不停地对聂荣臻和军团其他领导人抱怨,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不加隐藏。在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面领导指挥时,也没有私下进行,更是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的面。如果林彪有自己的政治企图应该会在私下进行,他并没有同彭德怀有私下的商议。而刘英的回忆更是证实了林彪此举确实是出自对红军的责任感。会理会议第一天下来<sup>①</sup>,林彪仍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他仍然对彭德怀说,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又一次拒绝了<sup>[5]</sup><sup>[74]</sup>。受林彪的信无辜牵连的彭德怀当时也是从公心来理解林彪此举的意图,“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sup>[2]</sup><sup>[199]</sup>。如果当时没有这种不满情绪的普遍存在,彭德怀也不会如此揣测林彪。

连日疲劳行军、频繁作战,有时又因敌情不明而战斗失利,出现各种怨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中央事前对

<sup>①</sup> 关于会理会议召开的天数有不同的说法。杨尚昆回忆说:“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132页)而刘英的说法则不同:“会议从5月12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收稿日期:2007-06-30

作者简介:陈清茹(1974-),女,河南汝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此也有担忧。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sup>[6]</sup>但这剂预防针并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多走冤枉路所造成的疲惫不堪和战斗失利，使军中充满了埋怨和不满的情绪。

在领导层中，其实不仅是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不理解，作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王稼祥也是如此。他曾对张闻天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sup>[7]</sup>。并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也有意见。在土城战斗中三军团第四师担任主攻，黄克诚认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就直接向中央写了信。

在一场战役中，存在不同的主张也很正常。反对林彪写信的聂荣臻在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就与毛泽东持不同的观点。彭德怀虽然认为红军采取穿插战术摆脱敌人的四面包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但因鲁班场和习水两场战役没有打好，心里也有些烦闷<sup>[2]198-199</sup>。

从当时已弥漫在军中的埋怨和不满情绪来看，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理解并不孤单，而他此举出自对红军的高度责任心也值得肯定。林彪多年来一直追随毛泽东，并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军中的地位不断地得以提升，应该说如果不是出自一种责任心，他没有理由去“恩将仇报”，因为此举可能会破坏两人的关系。此信可能引起的后果，林彪也不可能想象不到。遵义会议刚刚改换领导，此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其所具有的冲击力和爆炸性可想而知，况且此前聂荣臻还一再以林彪本身的地位和党的纪律来劝阻林彪<sup>[3]259</sup>。清楚知道此举后果的林彪仍然坚持己见，也说明了他的责任心。并且，林彪的主张也有他自认为合乎军事原则的成分。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需要机动灵活的指挥，这在党内也是共识。彭德怀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是红军长征路上的作战主力，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方便依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具体作战的方针，理论上也能说得过去。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看到林彪此信的内容后，“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sup>[2]198-199</sup>，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 二、误会的成因

作为会理会议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毛泽东的处境和

心态是不容忽视的。“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sup>[5]73</sup>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对军事的影响力逐渐削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军事最高决策层。此时他的权威地位尚未树立，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尚有待证实。

但事情并不一帆风顺。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就有三件事使毛泽东的内心很不平静：一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毛泽东受到了博古的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二是讨论打打鼓新场时，毛泽东不赞成，并以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后来民主表决，将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由彭德怀暂代；三是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刚刚被明确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自告奋勇愿意去。5月10日，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的战斗，强攻不下，而此时出现了林彪写信要求改换前敌指挥的事件。这一系列事情使毛泽东处在一种异常尴尬的境地。恰如杨尚昆所言：“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sup>[4]135</sup>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所有迹象也表明，他的军事指挥地位和能力在遭受普遍的质疑。黄克诚的信，刘少奇和杨尚昆签名的电报，直至林彪直接要求改换前敌指挥的信，让毛泽东不得不作一次正面的解决。

在具体事实并未澄清的情况下，毛泽东将事先不知内情的彭德怀视作幕后挑唆者也有其理由。因为现象上很多事情都与三军团有关。黄克诚是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刘少奇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是三军团政委。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可能都是受了作为三军团司令员的彭德怀的指使，而彭德怀没有在刘少奇和杨尚昆签发的电报上签名，则说明他的城府很深。更促使毛泽东确认这一判断的是，林彪写此信前曾与彭德怀通过电话，而彭德怀并没有向中央报告此事。这样即使彭德怀当即回绝了林彪的要求，由于当时林彪并没有申明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sup>[2]199</sup>，彭德怀陷入了有口难辩的地步。当然，彭德怀采取的“事久自然明的态度”<sup>[2]199</sup>，更是不能消除毛泽东误解的一个原因。诸多事情的巧合构成了一幅彭德怀“幕后挑唆”向毛泽东挑战的图景：虽然信和电报都没有彭德怀的署名，但其中的一封信并一封电报是出自三军团的领导人之手，一封信则直接提出让此前曾顶替毛泽东暂代前敌指挥的彭德怀再次出任前敌指挥。

会理风波受到牵连的还有张闻天。虽然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明说张闻天到三军团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张闻天是个书生，根本不懂

得革命战争<sup>[4]136</sup>。由此,毛泽东对张闻天也有了误解。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听信了别人的谣言,另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确实认为张闻天可能与彭德怀有私下的勾结。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毛泽东既然认定彭德怀“鼓动”林彪写信反对自己,张闻天就很难完全置身事外。至少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的事情他应该清楚,而他并没有向三人团说起此事,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张闻天、彭德怀、林彪三人确有勾结,一是张闻天顺水推舟,而这两者都会使毛泽东对张闻天埋下猜忌的种子。

林彪的信让两个无辜者受到牵连,而自身却在此后置身事外。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sup>[4]134</sup>,却将账挂在张闻天和彭德怀的头上。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毛泽东相信两人多年的情谊,林彪不会真的反对自己,另一方面则可能认为就林彪的资历来说他不会“野心”,他也不是此事的最大获利者,那么幕前的他可能是受到了别人的指使,所以真的把林彪当成了“娃娃”。

### 三、历史的启示

会理会议反映出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内容。首先,它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者团结一致、服从指挥的作风。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在一些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虽然军队基层以至领导层对中央以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多有不同意见和怨言,但仍坚决地按照上面的指示,互相配合,不独己见,胜利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并没有因为对中央的战略意图不理解 and 不满情绪而滋生事端,影响全局。即使是林彪等人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是通过一种正常渠道,出自对红军负责的心理,没有组织小团体争夺领导权的活动。

其次,它反映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顾全大局,将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毛泽东在会议上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彭德怀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他并没有同毛泽东、林彪等人进行争辩,而是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相信战友们会自己去

申明,以避免大敌当前彼此间可能会出现矛盾和隔阂,力求将负面影响化为最小。受到毛泽东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也同样忍辱负重,不加辩白,并努力维护毛泽东的权威,维持内部的团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彭德怀和张闻天以大局为重,将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再次,它反映了一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又勇于自我批评的品德。连日艰苦行军和频繁战斗,有时还就地打圈,间有战斗失利,对中央的战略决策有不满情绪是正常的,黄克诚等人并没有将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消极抵制,反而是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及时地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促使中央尽早地发现问题,最终有效地克服了部队内的动摇情绪。在会理会议上,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sup>[5]74</sup>,但他们又不固执己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会理会议最终能统一思想的重要原因。

会理会议虽然及时地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统一了思想认识,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在会上,黄克诚、林彪、杨尚昆等人的不同意见被指为“右倾情绪”,会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sup>[4]135</sup>,一时的意见分歧和思想认识错误被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sup>[5]76</sup>。

#### 参考文献:

- [1] 杨振保. 略论会理会议的重要作用[J]. 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1): 69-71.
- [2] 彭德怀. 彭德怀自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199.
- [3]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258.
- [4] 杨尚昆. 杨尚昆回忆录[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132.
- [5] 刘英. 刘英自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448.
- [7] 程中原. 张闻天传[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221.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uili Conference

CHEN Qing-ru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Led by Ma Zedong, the Red Army made efforts to cross the Chi River for four times and successfully escaped from the surrounding enemy, but the strategy of “only walking not fighting” caused widespread uncertainty in the troops. Out of hig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d Army, Lin Biao wrote letters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questing to replace the front conductor, which resulted in Mao Zedong’s suspicion of Peng Dehuai and Zhang Wentian. Mao’s authoritative position hasn’t been set up. Huili Conference, in the spirit of unity and collaboration,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victory of Long March.

**Key words:** Huili Conference; Ma Zedong; Lin Biao; Zhang Wentian; Peng Dehuai